

# 复杂地行动与思维——我们时代的方法论

(法)让-路易·勒莫瓦涅著

熊世英、张新木译

我是否能首先强调一个隐性的论据：当我们思考公民教育时，我们这里优先说的是**集体行动**的公民教育，而这种集体行动又处于“复杂地行动与思维”之中，并通过这种方式来实施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把公民教育理解为复杂性的顶点：当人们开始思考集体行动时，显然就是将思考置于一种难以预料和充满激情的背景之中：每个行为都是一次潜在的博弈，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，也可能是令人赞叹的。

我是否能再补充一点，我希望避免再走两条老路，这在复杂的系统领域中常常会限制探索的道路。第一条老路，我有点恶意地称之为教学式炒作，这种炒作旨在以“系统研究”的名义，如今也称之为“复杂研究”，去兜售毫无价值的夹生粥，这是销售顾问的拿手戏，意在说服客户，说只要在其报告中播撒上“复杂系统”之类的表述，他的研究就一准时尚。这就忘记了一点，即“**系统理论忽视了对自身基础的挖掘，忽视了对系统概念的思考**”（埃德加·莫兰，1977, 101）。另一条老路就是“伪学术”道路，它只想了解行家才看得懂的“算法复杂性”：这样的研究成果有时故弄玄虚，方法惊人，认为能解决问题，但往往对问题的本质和概念一无所知。这是一些为解决现成问题而采用的方法，却无助于人们提出新问题，即人们试图区别以便更好地解决的问题。

## 一 复杂性只是提出问题，而非解决问题

在清理了表述区别之后，让我们回到今天大家一起讨论的问题上。2500年前，普罗塔哥拉（Protagoras）就曾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过类似问题：在雅典集会广场上，集体审议行动的象征地，哲学家和打铁匠可以共同行使他们的审判权，“行动与思维同时进行”，其教诲可以这么理解：“思维，就是给行动和存在赋予意义”（Y. Barel, 1987, 9）。这种让公民教育归属于集体行动的召唤是祖传的做法，在我们的文化遗产中屡见不鲜。然而两、三个世纪以来，我们的西方文明常常忘却了这一点，过分突出专家的地位，忽视公民的地位。不久前，一位频频亮相媒体的技术权威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没有专家的眼镜，公民都是睁眼瞎。”还有众多的教育体制，掺杂着唯科学主义和精英主义，长期以来强化着文人（或学者）的亲形象，他们为平民（或实践者）思考问题，而平民只需行动和实施，不必反思文人吩咐他们做事的方法。

这种相当简略的诊断当然一直备受争议，即使这种划分还没到达难以忍受的地步亦然。再说半个世纪以来，反对者的意见渐渐得到听取，平民（或实践者）和文人（或